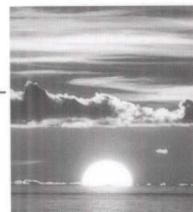


李冉著

中国共产党 政党文化研究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政党一经产生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传统文化的印记，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专属的文化风格，这种被称为“政党文化”的事物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



本书由复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共产党 政党文化研究

李 冉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 / 李冉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309 - 06971 - 6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共产党—文化—研究 IV. ①D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8387 号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

李 冉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梁 玲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57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6971 - 6 / D · 439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政党一经产生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传统文化的印记，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专属的文化风格。这种被称为“政党文化”的事物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政党文化是什么，如何建设先进的政党文化，对这两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两种研究范式——阐释性研究与建构性研究。本书力求两种研究范式的统合，并采取如下的技术处理：搭建一个可以满足阐释性研究需要的建构性分析模式。政党文化既是一个文化运动的过程，体现为政党塑造其文化品格的过程；也是一种稳定的文化形态，体现为人们的心理影像与社会的文化符号。以文化过程为视角，书中首先揭示了政党文化的本质——政权意识的形态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党文化的概念——政党文化是政权意识的形态化过程及其所形成的心理与行为标识。本书把政党文化的运动过程分解为三个层次——政权意识的培育、政权意识的党内形态化、政权意识的社会化，由此摹写了政党文化的四个基本变量——政权意识、政党心理取向、政党行为模式、政党形象。四个变量的相承关系支撑起了建构性研究的分析模式。运用这一分析模式，本书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形成、特征、功能与发展进行了全景式的论述。

感谢李冉博士付出的艰辛，上知天外高深，下晓地外幽微，他选择的切入点是政党文化，这既体现了他的敏锐和独到，也体现了他的深邃和广博。本书的出版，将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为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新方法，为实践研究提供一个新途径。希望本书能对广大读者有所帮助，对理论研究者有所启发，对实践工作者有所裨益。

关于文化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课题。由此就产生了许多文化，如政治文化、民族文化、家族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政党文化等。

李冉博士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一书，是他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加工、修订而成的。从一个较为陌生的选题，到博士论文，再到今天这样的一本书稿，应该说其走过的道路还是不平坦的。

2003年当李冉博士提出要做政党文化这篇博士论文时，作为导师，我就给他提出了很多问题。譬如说，按照阿尔蒙德关于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这样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是不是就意味着是中国共产党的“心理方面”的问题；再譬如说，政党文化是指这个政党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环境，还是政党自身的文化特征，抑或是指政党所生产的文化或者所从事的文化事业等。就是说，要研究政党文化，对于这个研究对象的确定性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我知道，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就成了李冉博士近年来的攻克难题。六年多来，我深知李冉博士为这部书稿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克服了学术资源不多等困难，试图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模式，为此，李冉博士五易其稿，三次大范围地调整写作框架。让人欣慰的是，现在的这部书稿，已经可以为他的不懈努力作出一些交代。

政党文化是一种静态的影像，投射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更是一种流动的符号，时刻处在变化当中。如何把握政党文化的静态构成与运动规律，是研究政党文化的一个重要课题。本书以文化过程为视角，首先揭示了政党文化的本质——政权意识的形态化过程。按照这个理解，政党文化的运动就有三个层次：政权意识的培育、政权意识的党内形

序

态化、政权意识的社会化。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政党文化的概念：政党文化是政权意识的形态化过程及其所形成的政党心理取向、政党行为模式以及政党形象。这一概念所包括的四个变量构成了政党文化的分析要素，四个变量的相承关系又支撑起了一个分析框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分析框架的搭建，不是作者“剪刀取材”堆砌而来，而由政党文化的运动过程总结而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作者才把这个分析框架称为“建构性的研究范式”，以区别“阐释性的研究范式”。很显然，这样的分析框架便于我们回答“政党文化怎么样”的问题，而对于“政党文化是什么”的问题也有较为充分的解释力。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提出了一种政党文化建构性研究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工具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进行了个案分析。全书读来，理论部分连贯流畅，理论与个案分析对接合理，个案分析不乏精彩。至于本书的分析框架是否合理，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但是这种追求系统创新的品质和严谨的学术态度还是要充分肯定的。

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本书对理论框架的重视几乎体现在每一个问题的论述上。但这种对理论体系的重视，也带来了一些不便。比如，本书严格采用既定的分析框架来阐释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一定程度上把问题简单化了。有一些历史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却不能在本书的分析框架中反映出来。此外，有些问题的论述还显粗糙、简单，比如政权意识的党内形态化与社会化的体制、机制问题，书中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观点，还需作进一步的论证。总之，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是个十分宏大的主题，有些问题需要通过广泛的交流与争鸣来逐步完善。万事开头难，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有意义的研究当中。

2001年7月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就包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内容。这些时代的新命题反映在学术研究中，就不能不

开展政党文化研究。应该说,先进的政党文化是党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标志,政党文化对公民文化的引领是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途径。2009年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命题,党的文化建设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的出版想必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价值。

是为序。



2009年10月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研究范式与写作前提	1
第一节 阐释与建构：政党文化研究的两个范式	1
第二节 阐释性研究的进展及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3
第三节 政党文化建构性研究的进展及其学术 合理性	11
第四节 本书的写作动因与立场、研究内容与研究 方法	16
第二章 建构性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分析框架	29
第一节 政党文化的本质——从文化的本质说起	29
第二节 政党文化的概念——从文化的概念谈起	35
第三节 政党文化的要素结构及其分析框架	41
第四节 专论：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政权意识	52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64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萌芽时期	64
第二节 革命型政党文化的雏形	71
第三节 参与型政党文化的失败及革命型政党 文化的确立	78
第四节 开放型政党文化的确立	93
第五节 封闭型政党文化的失败及开放型政党文化的 发展	104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特点	124
第一节 具有高度抗变性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	125
第二节 具有明显流变性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	135
第三节 具有独特历史内涵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意识	143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功能	157
第一节 政党文化功能研究的几个前提	157
第二节 政党文化的基本功能：阐释性研究的视角	164
第三节 政党文化功能的优化：建构性研究的视角	168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一）：政权意识的塑造	184
第一节 “科学性”之考量	184
第二节 执政合法性政权意识的塑造	189
第三节 执政有效性政权意识的塑造	199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二）：政党形象的建设	227
第一节 形象建设是政党发展的重要主题	227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的独特内涵	229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的若干断面	233
第八章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三）：有效克服政党文化的流变	246
第一节 有效克服由制度不健全导致的政党文化流变	247
第二节 有效克服由党内潜规则导致的政党文化流变	253
第三节 有效克服由文风导致的政党文化流变	268
参考文献	277
跋	288

在上人，或被赋予神的色彩加以神化，成为神明们的一个部分，人们通过祭祀和朝拜来表达对神明的崇拜。政党文化作为政党成员对政党领袖、对政党领袖的崇拜，是政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一章 研究范式与写作前提

现代政党一经产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一定文化传统的烙印，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专属的文化风格。如果把 17 世纪后期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作为现代政党的滥觞，那么政党文化作为一种现象，已经存在了两百多年。但是，政党文化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并加以系统研究，在国内学术界还是近年来的事情。近年来，随着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执政党建设的纵深化，学术界对政党文化的研究兴趣渐浓。与政治学三十年的蓬勃发展相比，当前政党文化研究尽管方兴未艾，但仍是一个“年轻”的次级领域，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其中又以研究范式问题最为迫切。探讨研究范式，是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要面对的问题。

第一节 阐释与建构：政党文化研究的两个范式

所谓范式，就是学术共同体中的研究者自觉认同和共同持有的一套信念、原则和标准。库恩认为，范式是共同体成员借以指导其研究活动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范式的存在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①，并由此必然形成一种连贯的学术传统。

学术研究的目的与方法是决定研究范式的关键因素。政党文化的

^① [美]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1、24—25、9 页。

研究目的,大体有两个:解读与建设。由此决定了两种研究方法:阐释与建构。前者重在描述一定政党文化的表征,或者进行政党文化形态的差异分析,即主要回答“政党文化是什么”的问题,这就是政党文化的阐释性研究范式;后者重在构建一定的政党文化形态,主要回答“政党文化怎么样”的问题,由此形成了政党文化的建构性研究范式。总之,正是由于研究目的与路径(方法)的不同,才最终形成了政党文化的两种研究范式,即阐释性研究与建构性研究。

政党文化阐释性研究往往遵循两个学术路径,并渐次演化出三个研究方向。其一,结构主义的研究路径。此项分析往往有两个理论预设。首先是把政党文化看作既成的文化现象,其次是把政党文化看作政治文化的亚文化范畴。遵循上述前提,探讨某一政党文化的形态构成,继而探讨不同政党文化的形态差异,构成了政党文化阐释性研究的第一个方向。其二,工具属性的分析路径,即把政党文化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分析工具。此项分析也有常见的理论预设。对多种政党文化而言,“不同的政党文化导致不同的政党行为模式”^①。因而,以政党文化为分析工具对政党政治进行对比分析,就形成了政党文化阐释性研究的第二个方向。其三,对单一政党文化而言,分析政党体制内的因素并不能够完全解释政党行为。正如迪韦尔热所指出:“政党的组织主要是建立在不成文的习惯及实践之上,它差不多全然是习惯性的东西。党的章程及内部条例顶多不过表现出真实情况的一个很小部分,因为它们很少得到严格执行。”^②对那些“不成文的习惯及实践”,似乎在文化的平台上加以分析是顺理成章的。由此,在文化的视野中对政党政治进行“应然”与“实然”的对比分析,就构成了政党文化阐释性研究的第三个方向。

政党文化的建构性研究也有两个学术路径。第一,功能主义的研究路径。

^① 袁明主编:《美国文化与社会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页。

^② [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党概论》原序,雷兢巍译,台湾青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VI页。

究路径。其基本理论预设是,将政党文化对于政党政治尤其是政党行为的影响看作不证自明的常识。由此展开政党文化的功能研究。“匡正政党行为,引领社会文化规范”,是政党文化的基本功能,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社会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应有之义。遵循这样的理论前提,探讨政党文化匡正政党行为、引领社会文化的体制与机制,便是政党文化建构性研究的第一个方向。第二,价值理性的分析路径,即不是仅仅把政党文化作为比较分析的学术工具,而是把构建先进政党文化形态作为建构性研究的终极价值追求。此项研究的基本预设是把政党文化建设看作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这是对传统党建模式的丰富。即党的建设不仅包括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还应包括文化建设。这种预设,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可能形成对传统党建模式四维内容的突破。沿着这个进路,探讨政党文化建设的出路,就形成了政党文化建构性研究的第二个方向。其中,中国传统理论中的“以文化成说”为此项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可见,政党文化的两种研究范式存有诸多差异。简单说来,在研究进路上,阐释性研究往往遵循结构主义的学术传统,建构性研究往往走功能主义的学术路线。在学术旨趣上,阐释性研究往往强调政党文化的工具属性,建构性研究往往着眼于政党文化的价值属性。在学术追求上,阐释性研究是把政党文化作为一种既定的文化现象来解读,由此来解释政党行为,以及进行政党比较分析,其核心使命是解决“政党文化是什么”的问题;建构性研究是把政党文化作为一个建构的目标来对待,其核心问题是解决“政党文化怎么样”的问题。

第二节 阐释性研究的进展及所要 继续探讨的问题

一、政党文化阐释性研究的进展

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的统计,近年来学术界以“政党文化”为题

发表的论文已近 30 篇。学术界对政党文化的研究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学术分期：2002 年以前政党文化研究大体处于“有话题无理论阶段”。一方面，政党文化话题屡现^①；另一方面，尽管有些学者阐述了政党文化的基本概念^②，但阐释性与建构性研究的分析框架没有构建起来，体系性研究没有展开。之后，政党文化研究进入阐释性研究的理论建构阶段。2002 年 5 月《政党文化探析》一文，首次就政党文化的内涵、特征、结构、功能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此后，政党文化研究逐渐为人所关注^③。

从发表论文的研究内容、目的与方法来看，这些论文多属阐释性研究的范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内容与研究目的来看，多为界定基本概念、阐述研究意义、明确研究主题、构建分析框架等，重点是回答“政党文化是什么”的问题，而对“政党文化怎么样”（即如何建设）的问题则鲜有系统的

^① 比如，李爱峰、苏全有在《发轫、争斗与失败：中国近代政党历程的反思》（《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年第 3 期）一文中认为，“民初资产阶级缺乏对政党文化的认识”，是民初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彻底失败的原因之一；又比如，谢伟民在《优秀文化与优良作风》（《党政论坛》2002 年 2 月）中指出，“党的作风问题实际上是对一种政党文化的认同”；还有人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呼吁要“善于撷取外国政党文化精华”（《政工研究动态》2001 年第 17 期），等等。

^② 比如，“政党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政治文化包括人们对政治的理念、价值、情感、信仰、思想、原则等各个层面。政党文化大致相同，它包括人们对政党的理念、价值、情感、信仰、理想和原则择取”（王沪宁：《从政党文化看执政党的建设》，《解放日报》1989 年 5 月 24 日）。再比如，政党文化是“人们对政党组织、政党活动和政党制度的价值判断、认同心理和评价取向等因素形成的政党活动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施雪华：《论战后西方政党文化的新变化》，《复旦学报》1993 年第 3 期，第 103 页）。

^③ 比如，下列文章颇具代表性：《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的政党文化转型》（吕元礼、邱全东，《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1 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浅析》（肖铁肩、丁芳，《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1 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构重要性与基本内涵》（陈金龙，《岭南学刊》2006 年第 1 期）、《政党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桑玉成、李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 年第 1 期）、《注重政党文化建设问题》（欧任国，《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 年第 1 期）、《政党文化建设模式与政党发展》（乔秀颐，《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 年第 5 期）、《关于参政党政党文化构建的思考》（申亚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 年第 6 期）、《试论政党文化与组织文化、政治文化的关系》（赵理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 年第 3 期）。

论述。

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用政治文化的理论模式来研究政党文化,是阐释性研究范式得以成型的重要原因。比如,在政党文化概念的界定上,学者们普遍采用了政治文化的分析框架。从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标准来衡量,赵理富对政党文化概念的界定最有代表性。他认为,“所谓政党文化,是指政党所具有的为全体成员所认同的意识形态(或说政治思想)、组织心理、制度规范、行为作风以及由此决定的政党形象。”^①与此相区别的政党文化概念还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认为政党文化主要是指观念形态与行为模式,制度规范并不包含于其中^②;另一种认为政党形象并不属于政党文化的范畴^③。笔者认为,这些概念并不存在根本差异。原因在于,这些概念的提炼基本上遵循了同样的思路,即政治文化“核心成分”^④的再集束、再组合。其实政治文化与政党文化有着较大的旨趣差异,政治文化的稳定性、先验性、客体性特征,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取向是阐释,而不是建构(此问题后文有述)。因而,用政治文化的分析框架来研究政党文化,是政党文化阐释性研究范式得以成型的重要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指出的是,很多学者事实上有意无意地强调了一个研究前提,即不能简单套用政治文化的理论模式来分析政党文化。但是,这种强调没有在研究过程中得以遵守,政治文化的理论模式还是被广泛运用。上述“研究前提”的强调有两种表现形式:

^① 赵理富:《政党文化探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第13页。

^② 比如,“政党文化是政党在长期的政治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在政党系统起导向作用的观念、态度、理想、道德、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等”(吕元礼、张子友:《执政文化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第46页)。

^③ 比如,“所谓政党文化,是指政党所具有的为全体党员或部分社会成员所认同的意识形态、行为准则、制度规范,以及全体党员对政党所具有的情感态度”(陈金龙:《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构重要性与基本内涵》,《岭南学刊》2006年第1期,第5页)。还比如,“政党文化化是指政党所具有的为全体成员认可的包括意识形态、制度规范、行为作风在内的观念体系”(柯新凡:《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生成》,《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第191页)。

^④ 美国学者罗森邦将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称为政治文化的“核心成分”。参见〔美〕罗森邦:《政治文化》,陈鸿瑜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4页。

第一，“有意地强调”。有种观点认为，在国内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文化研究热潮中，学术界对政治文化尤其是“政治亚文化”的深入探讨，直接催生了政党文化研究^①。由此可见，政党文化研究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衍生品，似乎摆脱不了政治文化研究模式的窠臼。但是，上述观点的提出者又指出：“作为政治亚文化之一的政党文化，政治文化的概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适用，人们一般认为政治文化指的是‘界定政治行为发生的环境的经验信念、政治态度、表征符号和价值的系统’。如果按照这个解释来界定政党文化显然过于宽泛，不利于政党文化研究的具体化。”^②显然，作者在这里有意强调：比之政治文化，政党文化的研究范畴要微观得多，简单套用政治文化的理论模式并非明智之举。

第二，“无意地强调”。有种观点认为，“比较政党研究的这两个路径(即政党研究的功能路径和结构路径，笔者注)并不能涵盖政党研究所有的领域。最明显的是它们缺乏对各个政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的关注。因此，对政党文化的研究就成为一项不可回避的课题，它应该成为比较政党研究的第三条路径。”^③第三条研究路径的开辟说明，政党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来自对以往理论盲点的补足。依照这种逻辑，我们看不到一定要用政治文化的理论模式来分析政党文化的内在必然性。与上述第一类观点相比，我们把此类观点视为一种“无意的强调”。

二、政党文化阐释性研究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政党文化的阐释性研究还不够成熟，要进一步完善它，就要正确认识政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属性差异，并对“用政治文化的理论模式来研究政党文化”的做法加以反思。

^① 肖铁肩、丁芳：《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浅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1 期，第 75 页。

^② 同上。

^③ 赵理富：《政党文化探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 年第 5 期，第 12 页。

(一) 正确认识政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属性差异

关于这个问题,现有研究已经有所涉及^①,但总的来说还不够深入。笔者认为,有必要充分明确两种文化形态的差异,这是完善阐释性研究范式的重要认识前提。

可以说,政治文化与政党文化都是作为一种“政治行为现象”逐步被认知的。这个过程反映了人类对政治本质的深入把握。但是,“政治”与“人们行为”之间的制约关系,在政治文化领域与政党文化领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在政治文化领域,上述制约关系首先体现为“人们行为”制约“政治”,即“人们行为”隐喻着一定的政治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最终对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在政党文化领域,这种制约关系首先体现为“政治”制约“人们行为”^②。由此来看,政治文化与政党文化的作用机制与作用过程大有差异。

这种差异决定了政治文化与政党文化的研究重心也是不一样的。邹谠先生指出:“Political Culture 是政治中的文化,而这里的 Culture,已不是过去人们所讲的高层文化,它更接近于我们所讲的日常生活方式。”^③可见,政治文化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大众文化传统对于政治(行为)的影响,即主要揭示“客体世界对于主体的意义”。而政党文化研究更多的是关注“政党主体对于客体世界的意义”,或者说是精英文化传

^① 吕元礼、张子友在《执政文化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06 年第 1 期)一文中探讨了执政文化与政治文化、行政文化与政党文化的关系。尽管没有直接论述政治文化与政党文化的区别,但对两者关系的认识还是有诸多启发的。此外,赵理富在《试论政党文化与组织文化、政治文化的关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 年第 3 期)一文中着重分析了政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差异。

^② 这种“政治”制约“人们行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政党主体来讲,先有政治意识形态,后有政党政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意识形态把政党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从逻辑上说,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有政党”(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5 页)。另一方面从党员主体来讲,先要承担党员义务,才能享受党员权利。《中国共产党章程》对有关权利、义务规定的顺序与《宪法》是不一样的,义务在先体现了政治对党员行为的前提规约。

^③ 薛涌:《政治与文化——邹谠教授谈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之一》,《读书》1986 年第 8 期,第 41 页。

统对于政党行为的制约。

概括地说,政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差异突出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政党文化具有鲜明的可塑性^①,政党有义务塑造自己的政党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具有突出的先验性与稳定性,在社会常态中,人们对政治文化的态度更多的是被动遵守。第二,政党文化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在我国政党文化的主体特征尤其鲜明,即政党文化有着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天然使命;政治文化有着鲜明的客体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政治文化的强大惯性中往往变得力不从心,政党只能无限对接政治文化的内核(这是政党塑造合法性基础的重要途径),而不能像塑造政党文化那样去塑造政治文化。

(二)有必要对“用政治文化的理论模式分析政党文化”的做法加以反思

政治文化研究模式的合理性是通过一系列学术支撑来体现的。这些学术支撑并没有被相应地移植到政党文化研究中,因而,仅仅采用政治文化的理论框架,将难以求得政党文化分析的精确性结论。

从政治文化理论的演进过程来看,其学术支撑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比较政治学。政治文化研究有着浓厚的比较政治学旨趣,这根源于两个基本判断。第一,文化因素是分析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和一个政治共同体不可忽略的基础和条件,对政治时代的理解和分析正在将人类社会的文化因素包括到自己的范畴中来。正因为如此,政治文化才被世界文化研究的热流送进了政治学研究的殿堂^②。第二,“不同的政治文化为不同政体涂抹了神秘而令人费解的色彩。”^③由

^①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指出:“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显然,列宁更多是从“政治教育”尤其是从“党化教育”的层面上来指称“政治文化”,这也反映出政党文化相对于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可塑性。

^② 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157页。

^③ 同上书,第157页。